

“全球性”语境的文化命题

——对《“欧亚”概念作为一个互惠利益
最大化的策略》一文的回应

□ 张胜军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拥有霸主地位国家的辐射力的关注早已超出政治与经济层面，而触及到文化的形态和功用。对于这一点，我们不难从对古罗马帝国、大英帝国乃至中华帝国的诸般考察中得到启示。甚至今天的美国人也看得很清楚，他们用“软实力”(soft power)来喻指包括我们谈论的“文化或制度”等因素。如果从历史的长时段来考察，大凡忽视“软实力”的帝国往往是不能长久的，如蒙古帝国等等。正因如此，赵汀阳先生的文章《“欧亚”概念作为一个互惠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引起我的浓厚兴趣，兴趣不仅在于汀阳先生从知识论进而策略论的高见，还在于他的文化之于霸权的独特视角。

我以为，赵汀阳先生切中的恰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关键性问题，即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重组”或“文化再造”。依照《“欧亚”概念作为一个互惠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一文的逻辑，美国并非一个成熟的“帝国”，它缺乏与之匹配的政治理论和文化理论。而如若缺少一个相应的高层次文化，人类生活品质的提高是极为可疑的。但由于美国文化庸俗而浅陋，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深厚而品质非凡，赵汀阳先生提出了欧亚文化联盟创新的新思路。

现代性与全球性

就从文化意义上提出“欧亚”概念而论，此文的命题显然十分重要而富于启发性。不过，在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野里，最关心的问题还在于“欧亚文化概念”所可能蕴涵的政治意义。在日益全球性的话语体系中，对民族/国家体系的超越逐渐成为讨论的焦点。在这里，民族/国家所依托的“现代性”正在被“后现代”的

“全球性”所置换。而所谓新帝国论或新中世纪论的许多表述,实际上是宣告了中心一边陲结构的终结,而被更加复杂的网络式结构所取代。这种现象的一种政治后果,就是国际政治的范式向着世界政治的范式转换。赵汀阳先生的欧亚文化概念,正是在此政治背景下的一种文化表达,也揭示出当前美国霸权招致抵制的两个主要对手的竞争势态。

然而,除却人们从一般意义上对“现代性”的反思,笔者颇感兴趣的还有东西方知识界对“现代性”认识的不同视域。在东西方对“现代性”的体认中,横向的中心一边陲比较与纵向的文化“进化论”曾经形成明显的反差。这个过程大致开始于15世纪西方与东方文明的迥异际遇。随着欧洲世界性霸权的逐步确立,曾经拥有高度文明的波斯、中国和印度被降到欧洲经济与文化的边陲。从此,东方知识界对现代性的认知和思索一直处于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处于另一端的西方文明成为东方社会“现代性”的天然参照。而在西方,约由18世纪开始,通过将全球不同地区放置在朝向欧洲工业文明的进步标尺上,文化比较的基本轴线从水平的空间方向转到了垂直的时间方向。进化论和等级制成为欧洲认同的支配性意识形态论的核心。

有意思的是,比照历史上东西方知识界对现代性的认知态度和思维方式,我们不难从赵汀阳先生的文章中体察到东西方的换位思考。站在东方立场上的中国学者采取了越来越本土化的立场,以欧亚文化的“优越”表达出一种新的文化等级观;而西方的学者在去中心化和去同质化的后工业社会中也日益主张文化自主甚至重新发现“原始”、“高贵”的东方文化。在笔者看来,这样的错位其实并不奇怪。它恰恰反映出东西方文明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反思终于在全球化的时代交叉在一起,全球性因而成为联结东西方知识界长期思想轨迹相交的一个结点。正是于此意义上,笔者认同赵汀阳先生的“过渡期”提法,只不过笔者认为这个过渡期的两端分别为现代性和全球性,是现代性向全球性的转向与过渡。

欧洲现代性发源于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知识由超验转换为内在,人类的知识最终成为人类改变自然的实践。现代性使人类的主客观世界乃至大众的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不仅因为它确立了世俗世界和大众生活的新范式,还因为它发展出高扬科学旗帜的知识和行动、民主/法律的政治制度。然而,源于内在力量与超验力量之间的内外部冲突(在欧洲表现出的内部冲突恰与欧洲对现代性的体验相一致,而在欧洲之外表现的外部冲突同样与前文提到的文化比较轴心相吻合)一直延续了数个世纪,并发展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最终,“除非透过现象的滤镜,否则自然和经验不可能被认识;除非借助于智性的沉

思,否则人类知识不可能被获取;除非通过理性的图式,否则道德的世界不可能实现交流沟通”^①。

作为现代性政治解决方案的一个结点,民族/国家和现代主权把超验状态和人类的内在逻辑奇妙地结合为超验的政治工具。霍布斯称之为“利维坦”,卢梭称之为“公意”。在形而上领域(如知识与行动)的“二元对立”之外,形而下之中也存在类似的微妙关系。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与代表调和理性的政府一道发挥作用,成功地把现代国家的政治超验性界定为经济超验性。

然而,现代性极其矛盾地搭建起来的大厦并不稳固。民族/国家式的主权虽然一度延缓和转移了现代性危机,但它带来的政治危机、冲突和战争激发出新的革命力量,并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民族、国家和人民之类的概念。现代性衰落、民族/国家式微的征兆首先表现在后现代批判的触角之中。后现代主义思想挑战现代性的二分逻辑,肯定破碎社会的同一/统一性。后现代主义吹响了破除现代主权二元对立的号角。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它具体体现为解构正统统治设定的界限,打破民族/国家旗帜下的僵硬对立,而重视无规律的、不可控的国际交往和国际运动。

笔者理解,后现代主义开启的智性思考开放而富于弹性,它拒绝以二元分裂的视角看待世界,把相互对立的社会融入连贯的社会总体,实质上超越了中心一边陲结构特有的不均衡的主权冲突。笔者因而认为,全球性是现代性危机延续的第二个结点,它虽然仍不是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但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国际关系中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于日益增长的主权主体的平等性扩展,包容而非排斥的新生主体内容正在消解民族/国家代表的主导范式。

全球化之中的世界市场和资本—消费循环的作用催生一种新的等级结构或恒常的等级化过程,全球性即是当今世界差异性无限裂生的外在特征。无限裂生的差异性淹没了任何二元划分,同时催生新型的政治力量和运动。因之,从现代性到全球性,从文化等级论到文化自主观和文化多元论,全球社会的转型及其政治效应给予寻根和认同的文化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

帝国与文化

当今的全球权力结构固然延续了欧洲中心一边陲结构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残

^①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著:《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3页。

余,但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新颖的权力结构和逻辑背后却是愈为分裂的文化旗帜。为理解全球体系中的文化过程,我们有必要重新比较和思考帝国扩张中的文化现象。

全球体系中的文化过程,如果发生过融合的现象,那么它首先发生在地理的扩张过程之中,而在帝国扩张过程中,文化的扩散方式又与权力、认同和文化建构等概念密切相关。在古罗马帝国,为了维持对罗马的认同,体现罗马人的高贵,罗马人采用了建造宏伟建筑、强制使用语言、灌输罗马宗教、推行罗马法典等形式。但是这些变化不是文化接触的例子,而是认同建构的方式问题。这种方式带有帝国的强制力,涉及到政治经济结构在广大地区的征服、确立和转化,是一种同化方式。大英帝国大致采取了同等措施,在它的殖民化进程中,日不落帝国的教育制度同时被移植到广大第三世界地区。

在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文化从帝国体系中心向边缘“扩散”。但在中华帝国,文化的渗透出现了反方向的运动。中华帝国的同化方式体现了文化的持久作用。不过它是有条件的。这大概就是赵汀阳先生的立论前提,这就是当高端文化遇到低端文化之时,征服者的低端文化也会逐渐被同化。

显而易见,在扩张与收缩的霸权和文化的消解与整合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系。乔纳森·弗里德曼在《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一书中试图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在成长着的帝国导致文化同质性的增强,这是通过出现在精英认同和它对臣属人群的影响之间的关系实现的。在衰落时期,反向过程开始了。主导性的文明或现代性认同再也不能满足它自己的要求,在主导型的现代性所压制或被它所取代的文化传统中,人们在寻求着能被发现的替代性认同。”^①

文化的传播和融合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正反两个方向的文化力增强了文化优越论的依据。我们或者因而有根据断言文化之于霸权的重要性。但赵汀阳先生的优越观并非进化论的。同样是文化优越,今天的文化优越视角则越来越强调文化本身的品质,而与政治权力和经济中心拉开距离。但是,文化共生的现象也颇为常见。在今天的世界上,文化之间的共融共存并不必然以另一种文化的消逝为代价。

一种反驳的意见或许认为,那是由于国家边界的作用,所以,现代性的文化融合,在民族国家取得大体均势之后基本中止。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当政治疆域逐渐被超越和突破的时候,当全球性取代现代性的时候,这种文化的共容局面还会持续吗?

^① 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高丙中校,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1页。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揭示和认识帝国文化扩张或霸权“软实力”生长背后的哲学意涵?古代世界的帝国兴衰曾被视为一种历史循环的自然现象。从修昔底德到塔西佗,从雅典到罗马,帝国不断由“好”的统治方式向“糟”的统治方式转换,即从君主制到暴政,从贵族制到寡头制,从民主制到僭主制,然后周而复始。波利比奥斯对此种现象的深入研究试图揭示帝国兴衰的内在逻辑。在他看来,罗马帝国代表了政治发展的顶点。由于同时拥有三种“好”的统治方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罗马帝国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走向腐败和衰落。马基雅维里在论述罗马帝国衰落时则认为,帝国之存在在于自由与扩张的结合,基督教由于泯灭了异教社会所支持的市民激情,而破坏了市民热心参与公共事务的帝国自我调节机制,所以成为罗马帝国的摧毁者。

在对帝国周期的诸多诠释中,至少有一种逻辑可以清晰地得到辨认,这就是帝国的扩张依赖其博大、自由的包容性。只有通过容忍差异,接纳各种成分的臣民,才能形构普遍融合之上的权力空间,达致广泛共识并提供合法性增量。进而,通过把差异想象为一种文化符号而非原质的、分离的政治符号,不但降低了冲突的频率和烈度,而且增强了帝国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而在帝国衰落期,政治控制机制的僵化已不能容纳得到解放了的主体,文化排斥和精神危机事实上正是没落帝国的共有特点。

霸权与大众文化

我们正处于一个极度模糊而困惑的时代,日益加深的困惑更削弱了我们把握今天的洞察力,以至于在临摹时代的宏大叙事尝试中,我们经常语焉不详。从塞缪尔·亨廷顿的《我们是谁?》到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帝国》,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到乌尔里希·贝克的《全球化时代的权力和反权力》,我们怀疑自身的身份和认同,看不清资本帝国的疆界,在历史中迷失,也对新时代的超级游戏感到无比震撼。

不过,有一点我们的感受是相同的。这就是面对美国霸权及其大众文化的无形渗透,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都承受了相似的压力。这个压力在赵汀阳先生的文章中也得到了明确表露:“强大的美国文化席卷了亚洲,到处再生产了带有地方特色的通俗美国文化,形成对亚洲传统文化的文化生态破坏。”从一些方面看,美国的文化霸权已经颇有显露。美国之大众文化挟全球化之威,颇有继续扩张之嫌。在赵汀阳先生看来,这难道不值得警惕吗?如果美国果有文化霸权之心,欧亚之间的文化结盟难道不可以吗?

显然,如果任由美国大众文化肆意传播的确也会产生意料不到的后果,包括政治上的后果,也可能导致文化上的后果,如对文化多元化的损害。尤其对于拥有悠久传统文化的国度而言,它的正面和负面影响都值得重视和研究。有些影响在西方人看来无疑是“进步”的,如通过好莱坞影片的传播,中国基层社会渐渐出现用司法诉讼保护权利的新动向^①。但更多的是一些负面的影响,诸如暴力、色情 的传播以及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损害与颠覆。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提醒说,美国的软实力“大都朝着一个方向,因为美国人如果不是对别人文化全然无知的话,就是心胸狭窄而霸道”^②。

尽管如此,笔者仍对此文化立场颇感困惑。在笔者看来,我们之所以把今天的时代与过去的帝国扩张联系起来,其原因并非出现了传统意义上的新帝国,而是由于全球资本的扩张,文化的交织和互动达到甚至超过了过去帝国时代的程度和规模。如果说今天的世界上存在着一种扩张性的文化,它便是附着在全球化载体之上的经济和商业文化。全球化的生产主体、创造主体构成的民族复合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文化全球化过程。这个过程在当前的重要表现就是消费文化的全球传播。美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一文化。

依据前文提及的帝国扩张逻辑,今日美国霸权扩张亦应有其合理的内核及其与生俱来的缺陷。一方面,美国的多元主义和自由民主超越了国家、种族和宗教的限制,这些已经体现在它们与全球化意识形态息息相通的各个方面,美国拥有与大众文化的生命力合拍的深层历史动因。某种意义上,美国大众社会的胜利最终导致了欧洲霸权的终结。对于这一点,无论是黑格尔还是托克维尔都曾深刻地予以察觉和体认。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大众民主及其主动性和扩张精神的分析,使他痛苦地意识到欧洲不可能继续保持对世界文明的控制地位。在黑格尔那里,美国也被当作未来的国度和欲望的领地。但在另一方面,美国霸权从一开始即有其自身的危机。“美国梦”和“美国生活方式”在赋予个人以享有社会流动和争取财富与自由平等机会的同时,并不能克服欧洲的危机。虽然更多新主体被资本解放出来,但能够对之加以本体论置换的,亦即具备人类本体构成特征的生态政治空间却不存在。换言之,当美国霸权取代欧洲霸权后,世界范围的生态政治实践仍然缺少本体论基础,并体现为构成世界性政治的社会力量冲突缺少调解性模式。

^① 参阅 Elisabeth Rosenthal, “Chinese Test New Weapon From West: Lawsuits,” *New York Times*, June 16, 2001.

^② Walter Lafeber, *Michael Jordan and the New Global Capitalism*, New York: Norton, 1999, p. 110.

超越危机的方式在于对主体进行本体论的置换。从该意义上来看,未来欧亚文化意义上的复兴,必然含有容纳和包涵为美国式文化所忽视和排斥的新主体,它扩大的主体和新的包容性,还应当具有赵汀阳先生所强调的知识意义。它还要创造新的活力和新的核心。新的主体论不是含有一个区域,更不是一个国家,而是在开放时空中,由趋于普遍性的人类特殊性构成而重构的本体论。

然而,或许由于全球化是由富人所支配的,而非由各种不同社会的跨文化互动,而是由一种纵容特殊群体反对所有其他群体的行为向前推进。这样一种事实使得我们的文化命题首要的是对全球化进行反思。在罗马帝国的兴衰中,罗马文化的兴盛是随着军事扩张而同步进行的,随着罗马军事力量和内部的分崩离析,所谓罗马的文化霸权也随之销声匿迹。文化的扩张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对其他国家带来危害,至于它对霸权国的有利影响,则是不容否认的。所以,所谓文化的霸权根本就不是孤立的事物,对于这种不是孤立的事物,试图采取孤立的措施加以遏制,也是非常不明智的。返诸今日世界,只要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仍据世界首位,即便其他国家在文化上结成了同盟,也不能使美国文化的影响力遽然消逝。

另一方面,即便美国形成了所谓文化霸权,它对其他国家的文化造成损害的观点也是颇为可疑的。因为历史上曾经有过无数的事实证明,文化的生命力反而在于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隔绝,独立发展,美国文化影响的扩大,从某种意义上可能增强其他文化的生命力,而不是削弱。

对于知识界而言,形成一种自我文化的自觉仍是必要的,这种自觉建立在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和对其他文化的欣赏和借鉴的心态上,而不是褊狭的排斥和拒绝。就文化观而言,树立正确的心态是当前的当务之急。文化应当是鲜活和充满生气的,很少有文化是固定不变的。如果自身文化受到冲击,从长远来看,它未必是坏事情。有生气的文化是变化中的文化,并且还借鉴其他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可以借鉴欧洲,但未必不可以借鉴美国,只不过,这种借鉴不取决于任何个人的偏好,而是一种整体的行为,它的规律还有待探讨。赵文的一个重要性即在于,它重新提出了如何理性对待美国的大众文化问题,而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亟需得到国内知识界的理性而清醒的梳理与回应。对于许多转型中的社会而言,美国大众文化的进入仿佛是现代化的附属品。表面上看,它是许多追求现代化的国家必须支付的一个代价,它随着国门的开放而进入却又防不胜防。但如何理性面对和处理美国的大众文化?显然,简单的处理方法并不可取也不会取得成效。无论是采取封堵行为还是采取鄙视的态度,都不足以彻底解决我们面对它而产生的莫

名困惑。

全球性语境的文化命题

20世纪后期文化之复兴源自现代性之衰落。随着对发展、进步等所谓普世性观念的怀疑,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决定主义以及对文化自身的迷恋一度支配着文化研究的日程。文化曾被理解为“文本”和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具体化。但随着围绕属文化和特殊文化的持久争论,到上世纪末期,人们再次转变了对文化的看法:文化不是我们力图加以掌握的外部或远方的事物/文本或隐含的编码符号,而是富有意义的人类实践所产生的并不稳定的范畴,是将意义赋予世界的、社会性的、情景化的行动产品,以及社会之间多种相互作用的复杂结果。即使文化相对主义之父弗朗兹·博厄斯也十分清楚组成文化因素中含有舶来品的程度。文化人类学者罗萨尔多更是指出:

在后殖民世界中,将真实的文化作为内部紧密结合的自主性世界的观点再也站不住脚。“我们”和“它们”,都不是自我包含(self-contained)和同质性的,像我们曾经出现的那样。我们生活在相互依赖的20世纪后期的世界上,这个世界被可渗透的并可直接跨越的文化边界之间的借来与借去所标记,充满着不平等的权力和支配。^①

所以,如果文化总是被实践的产物,它就不能被理解为由于某种原因而变成异质化的自主客体。换言之,许多被认为是同质性的东西实际上是霸权的结果或广义上社会化的结果。依据这种观点,弗里德曼指出,文化不是只为权力所约束的任何人可参加的竞赛。它是稳定社会再生产中自身特征的产物,是产生世界或世界的同类经验的倾向,是产生对世界和对相似的欲望及动机进行解释的类似框架的倾向^②。

既然文化的变动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针对目前危机的反应,那么,当全球化成为时代变革的标志,并逐步压缩世界的生活空间以至于堪用“地球村”加以形容的时候,一种时代的文化变迁及其所赋予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说政治主权的创

^① Rosaldo, R., "Ideology, place and people without culture," *Cultural Anthropology*, No.3,1988,p.87.

^② 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高丙中校,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4-115页。

议是为了解决跨国性的问题,那么在全球性语境中,文化意义上的基本命题又是什么?

在赵汀阳先生看来,美国价值观、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不断扩散不仅是对文化的败坏,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类文化危机。因此,重建“高端引导低端”的文化结构,扭转“向低看齐”的堕落方式,以文化的优势而德治天下就成为时下当务之急。龚刚博士在回应之文中,亦着力阐述从理想国到理想天下的德行/哲性内涵。

然而,笔者认为,全球化的本质特征还在于对全球的意识,进而成为全球性语境的文化之基本命题。在该意义上,全球性不应当被理解为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同质化,而是对“全球境况”进行的动态理解。同时,强调文化整体冲突的视角,也不能忽略在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多元文化及其冲突的广泛存在。思索全球性语境的文化重组与再造,就是全球性语境下的文化命题。也就是说,为了与一种后民族/国家的、多元民族/国家的、无民族/国家差别的和民族/国家间相互容忍的世界相匹配,一种文化上的命题随之诞生了。

因之,软实力仍然是一种霸权哲学的思维,它利用文化而不把文化作为目的(当美国人用一个十分“功利”的术语“软实力”来表述他们的帝国观之时,“软实力”其实代表的不仅仅是文化力量,而是一种多元化的时代非军事力量的统称)。也正因如此,笔者十分认可赵汀阳先生强调的文化的兴盛和繁荣才是最具追求之价值的观点。

从人类的生活而言,文化的发展又有其规律,这就是赵汀阳先生所说的高端和低端文化之本意:返归到文化本身的发展,知识界理应承担起创造灿烂文化之重责,而对不良文化提高警惕。但赵汀阳先生无疑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这就是体现时代的高端文化不应为西方所垄断,有着数千年文明的中国则在这方面很有优势。在笔者看来,这正是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当“现代性”作为一个文化比较轴心的坐标已经失去其原有的根据,并依据后现代文明世界中的文化本位和文化中心观,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构成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

对全球性语境中的国际社会而言,强权哲学的盛行与文化的繁兴也不同步,它们本来都有各自的轨迹,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和内在逻辑。它们的巧合是常见的,此消彼长也司空见惯。挺文化还是挺霸权犹如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正是反观到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文化所出现的危机,弗里德曼说,“我赞同对现代性危机做更客观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将世界文化和认同放置在世界体系转型的背景中,不是将它理解成沿着自己的路走向社会主义,或者是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进

化性总体,而是把它理解成文明体系的更有周期性的充满灾难的历史”。^①在他看来,文化的多元主义是世界的真正的后现代化的西方体现:去霸权化和去同质化的世界的族群化与文化多元化,这个世界对从前所强加的同化政治或文化等级制是无能为力的。^②

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化命题。赵文从欧亚文化联姻而触及到的,笔者认为,它不应是服从于应对霸权的狭隘需要,而是这样的一个命题:所有种类的文化都打开新视域,致力于地球的和平和所有人之安全并产生伦理真理的文化创新。

① 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郭建如译,高丙中校,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48页。

② 同上,第150页。